



耕耘换得花竞秀

——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概述(上)

杨占平

但富有诗意的语言,笔触细腻而生动,对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和诉求、农民与土地、农民与粮食、农村现状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困境、困惑、出路等系列问题,都有直观描述和深情展望,刻画出一幅当下农村生活的全景图,是一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实生动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了解认识农村问题的鲜活教材。

坚持兼容并蓄 实现艺术突破

“赵树理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思想内涵要丰富,其艺术表现方式也要具备独特性、开创性。从这次的获奖作品来看,艺术表现方式可以说各有特色,而且许多作者在表现方式上都超越了过去本人的手法。比如,获得诗歌奖的孔令创的《不可测量的闪电》,就是一部有想法、有作为、有创意的诗集,凝聚着诗人对世界、对生活、对时代的思考,以及个人体验与生活背景的交错和沉浸,蕴含着理解生命意义之后的顿悟和升华,从中可见作者对人生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体现了在他开拓的诗意空间里的游刃有余,富有张力和质感。另一位获奖诗人王俊才的诗集《农谚里的麦子》,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有一种断崖式的高耸和飞跃,能够看出诗人在某个节点,忽然听到了某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声音,得到了某种不可预测的召唤,有如神助地写下了一组对故乡、对自己可以有所交代的诗,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境界。

“赵树理文学奖”给那些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一种启示,即:作家要想写出好作品,必须在提高自身文学艺术素养上下功夫,这就希望大家要不断地学习,广泛地阅读,不仅要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涉猎外国优秀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还要了解国内及世界文坛的走向,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借鉴国内外文学领域先进的创作理论,多角度地吸收先进文化,在以往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寻求突破。比如获得短篇小说奖的袁省梅,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小说作家,但她仍然在不断进步,提高素质,注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进行很好的融合。这次的获奖作品《流动厨房》,用一个丧偶女人的生活片段,抓住了农村生活的精髓,笔下的农村流动厨房,几乎是丧偶的代名词,这个囊括生死的概念里,蕴含着生命的律动;流动厨房奔波在乡村之间,而流动厨房里的人,也在情感中寻找着出口;世间的人们,正像一个个流动厨房,存在于生死之间,体验着世界百态。同样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梅钰,此前已经获得过文学界不少奖项,但她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些年一直在寻找创作上的突破,效果显著。这次的短篇小说《十二连城》,故事呈现的是人与乡村的关系,三代女性都曾有机会走出乡村,可她们却都不约而同地被生活阻滞,女人们像土地一样孕育生命,可自己的生命却被困在土地之上;脚下的黄土,总是以某种方式与人保持着不可磨灭的羁绊;作为村庄的象征性标志,“十二连城”如宿命一般被凝视、被铭记,审视着乡村带给人们

命运,尤其是对女人的制约,现实意义还是强烈的。

跻身全国一流 展示晋军实力

这次一些类别的获奖作品,拿到全国文坛上去比较,无论从思想内涵深度,还是从艺术表现力上,都不逊色,质量是经得起社会和文坛检验的,比如文学评论和网络文学获奖者,就是证明。金春平的评论文章《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与范式》,系统、全面、深入地对“文学叙述中国故事”这一新时代重大的文化政治学命题,进行了学理性阐述和分析,由此解读并构建出诸多中国文学发展“方向性”和“未来性”的理论话语、范畴维度与叙述方法,显示出作者对这一命题的深刻理论发现与整体意义认知,在全国文艺理论领域也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董晓可的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具有开阔的批评视野、鲜活的现场热度,既有学院派的深刻性,又有作协派的饱满激情、文风灵活生动的特点;既有对名家新作的及时跟进,又有对基层作者的深度关注;评论涉及范围广泛,以探求艺术之“真”为向度,以采撷文字之“美”为宗旨,以发掘人世之“情”为要义,以探索存在之“痛”为根底,展示了文学评论的魅力,代表了当今全国文学评论的一种走向。

网络作家董群(网名:纷舞妖姬),近年来致力于把网络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是轰动一时的电影《战狼》《战狼2》的编剧,此次他的获奖作品是5卷本长篇小说《特战荣耀》,讲述了一个技能突出、个性鲜明,但缺乏集体主义观念的“兵王”,经过一次次严峻考验,最终实现由“小我”向“大我”转变,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故事;作品处处显示着军人的天职使命与责任担当,在当下新时代的进程中,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力量;小说已经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上映后反响强烈。另一位网络作家栗科(网名:红眸)的长篇小说《非常疑犯》,从悬疑角度深入现实,故事引人入胜,逻辑推理能力强悍,对事物理解客观准确,塑造人物形象生动,文本中处处可见职业的印痕、心灵的探幽,非常集中地体现出专业性工作履历对于文学构造的滋养,是一部借助了法医职业赋能,又彰显了小说日常锤炼的文学工匠精神的优秀网络作品,代表着全国网络文学写作的发展方向。



乡愁悠悠 剪不断理还乱

刘纪昌

如果说,有什么动力能让我十多年坚持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流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的乡情,下了眉头却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是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平房窑洞走进高楼大厦,从割麦挑粪的农家子弟变成国家干部或企业家、作家的。虽然身份变了,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但身上早已打下了黄土高原农家子弟的烙印,血脉里流动的,还是农民的血液,从血缘上、感情上、社会关系上都与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并且时刻关注农村、关心农民。这是中国农耕文明基因中遗传下来的一种情结,一种情怀,一种诗意,更是一种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乡愁。

从2004年创作第一篇《妈妈的手擀面》《酱豆的滋味》开始,这种浓浓的乡愁就成了我笔下不变的主题。为农民发声,留一份乡愁,就成了我创作的志向和目标。这么多年,身边的朋友一直戏称我为乡土作家。这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既是对我乡土文学创作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山药蛋派”身份的一个认定。

“山药蛋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农村、写农民。而《扶贫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是一部货真价实、不折不扣以乡村为背景、以农民为主角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我文学创作实践的真实体现。

我虽然不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但对农村、农民的关注却是持续不断、一以贯之的。多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下乡,接触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作为帮扶工作队一员并兼任队长,4年时间吃住在村,和农村、农民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对农村问题有了更直观、更深刻、更具体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受。4年时间,我深入田间地头,和基层干部交流,和农民沟通,对农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出现的困惑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努力用文学的语言和形象真实地表达。

这部书首先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对于现在的农村,我的感情很复杂。这么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乡村诗情画意,美不胜收,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有知识、有抱负、有能力的青年农民离开农村加入到城市创业行列中去了,留在农村的年轻人数量在下降。传统农耕文明正在为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耕作所取代。我驻村帮扶的大吕村过去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小村子,许多人会打铁,铁匠上有一条专门打铁的道路,家家户户门口有一个土炉子,常年四季炉火通红,叮叮当当打铁之声不绝于耳。以农民为主的村中刻着美丽的弧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和钢碳的味道,汗流浹背的铁匠全身心投入,专心致志地盯着通红的铁块,在一阵紧凑的重锤之后又是一阵细腻、轻柔慢打,一把结实轻巧的铁锹或镰刀就在一阵中诞生了。那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韵味。但现在,代代相传的手工艺甚至是生活技

艺濒临消失。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怎么能吸引年轻人留在乡村,怎么能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和家乡能有足够的收入,安居乐业,幸福地生活,这需要全社会去关注、思考和解决。其次是这本书真实地展现了当今的农民形象。说实话,现在的农民和过去意义上的农民已经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概念。过去的农民在农村,心也在农村,实实在在地在土地上耕作,靠土地收入生活,甚至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视土地为生命。而现在的许多农民并不靠土地收入,而且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都是社会变革带来的结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关注在这个巨大转变中每个人命运的状态和走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政府和社会对农民给予最大的政策优惠,让农民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

这本书第三个特点是真实地反映了扶贫干部的帮扶过程。下乡驻村帮扶整整4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和决心,基层干部的用心用力、帮扶干部的真诚实在,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本书是我4年帮扶工作真情实感的真实记录。因为是亲身经历,讲的又是身边人、身边事,有悲有喜,真实具体,所以生动感人。书中既有走村串户、访贫问寒与贫困户的真情沟通,也有设身处地、实实在在对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具体帮扶;既有根据贫困村实际情况寻找产业项目、壮大集体经济的积极探索,也有对农村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全书不仅渗透着我们这些扶贫干部对贫困群众的真情厚意,也体现了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既看到脱贫攻坚的成果,也感到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本书是我发自内心的真情之作,里边每一个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同时也是一个类型,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比现实中的本人又更具有典型性。写到贫困人口生活的窘迫和艰辛时,他仿佛就是我的亲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我把几十年累积的情绪调动起来,有机地融合在这些人物身上,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生动、更具有感染力。比如《老梁娶个小媳妇》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好多人看哭了,就是因为他是农村孤寡老人的代表。许多人由此理解了老人的孤独,还有人看过之后深受教育,主动给失伴的父母找个老伴,说明这篇文章有了作用,有了社会意义。

《扶贫纪事》只是我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不会是我文学创作的最高峰。至于以后的写作,我还是坚持写农村、写农民。用我手写我心。农村是我的根,是我的精神家园。书写农民是我的责任和义务,留一份乡愁是我的目标和追求。现在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乡村度过,我要用手中的这支笔,继续书写农村和农民,把更多更好的农民诞生,更真实的农村生活,更美好的乡愁展示给更多的读者。

2022年底公布的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作家和作品,总体上代表了这3年来山西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其中一些作家、评论家的获奖作品达到全国水平,在全国文坛曾引起关注;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占到越来越大的比重,70后和80后作家为主要获奖者;另外,基层作者、一线作者占一半以上,女性作者占三分之一多,这些数据说明,我省文学创作队伍老中青梯队合理,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分布适当,文学生态良好,发展潜力向好。

紧贴大地书写 突出时代精神

文学界以及众多读者都知道,赵树理本人的创作原则是尊重历史、关注现实、发现问题、表现民生,他的所有作品都贴近人民,都具有时代性、都富于探索性和可读性。所以,这次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特别要求获奖作品和获奖文学新人、优秀编辑,都能够像赵树理一样,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坚持深入生活,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中获取素材,准确把握生活本质,突出时代精神,努力拓展艺术视野,勇于在表现形式上创新;同时,要像赵树理那样,做文先做人,自觉自愿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树立民生为本的情怀。获长篇小说奖的阿连的《一个人的哈达图》,是一部新版走西口图景;哈达图作为西口一个曾经是各方人员逃荒避难聚居的小村落,上演过复杂的情仇爱恨,但在叙述者眼中,闪耀着纯净的人性光芒,世界仿佛回到了原初的平和状态;故事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爱、怜悯、关怀主题,书写出了那片土地对人的馈赠和养育;结构方式和语言风格,特色明显。宋峰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河之洲》,则是紧贴大地书写,讲述了宋长河一家三代历经半个世纪的奋斗历史;作者以乡土文化的倾听者、参与者和叙述者多重身份,深入到“白云、苍狗、尘寰”之中,彰显出鲜明的历史感与现实性;同时,礼赞人性的真善美,对现代人精神返乡进行了认真思考,描摹出了民族百年来的兴衰荣辱和发展进步轨迹。

“赵树理文学奖”一直重视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山河之诺:右玉精神英雄赞谱》,作者郭虎就是右玉作家,他从小到大生活在右玉县,一直工作在右玉县,见证了“右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在数十万字的篇幅中,饱含着他对他家乡那片土地深沉的爱、炽烈的情,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创造伟力,反映了右玉人民“子子孙孙无穷匮”的当代愚公移山之志;主题宏阔而又壮美,竖起了一座“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丰碑,塑造了一个“功成不必在我、奋斗一定有我”的典型英雄群体。阅读这部作品,读者可以更为形象地理解“右玉精神”的内涵。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寂寞国土姚以价》,作者王秀梅以严谨、客观、公正的态度,写出了辛亥革命元勋姚以价戎马倥偬的坎坷人生,追求真理的爱国情怀和复杂的心路历程;作品资料之丰富,内容之翔实,考证之全面,表现出作者训练有素的史学修养;鲜活通脱的文字、不拘一格的结构,又展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成功地还原出一位真实生动的历史人物。而刘纪昌的长篇非虚构文学《扶贫纪事》,以脱贫攻坚为大背景,使用朴素

相对于创作技巧,我更相信从素材里自然生长所具有的力量。小说创作应从生活中抽取更多的真实。

我们无不以局部或碎片的方式留存在他人的记忆里,少有机会目睹他人完整的一生。只有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某个人物的起始和终结,并由此洞察到这个人的人生形态。如果没有小说,这个世界想来会少掉很多值得记录的私密时刻,来自童年的某些东西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我大概也只能困在命运准许降落的狭隘区域,再也走不出来。时至今日,小说仍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揭示人类的最好媒介。

小说家创造人物,让各种人物在小说中相见,在小说中沟通、和解,比起在生活中更加赤诚。小说的自由容许我以1%到100%的不同浓度把自己溶解到笔下的人物里,探寻生活的真相,探寻自己,以及解开来自自我的束缚。早期习得并接受的小说理论,小说是不可能把原原本本的生活搬进来的。即使只考虑隐藏自己,放手去写,也需要虚构。然而,随着写作的持续进行,我越来越意识到,回忆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和想象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奥康纳所说,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完全写实,关键在于小说作者是否拥有那种让小说别具深意的眼光,也就是“洞悉隐秘意义的眼光”。或者换成娜塔丽·萨洛特的话:“具有真实性的事实可以使我们进入未经探索的区域”,也一样有说服力。

可能就是由于这样,这几年,我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拒绝使用技巧,拒绝让我写的那些看上去更像一个“故事”,而是倾向于写出“事物本来的样子”。记忆的碎片如果只经历即兴的口述,除了掉回原处,不会产生任何意义或价值。所以,小说家更像碎片收集者和整理者,从浩瀚、凌乱的碎片中找到最有用也最稳定、最有力量、让它督促着你把它写下来。在需要技巧的地方,灌入情感和真切——这始终是文学的基础所在:情感和文学的真切性。这个真切,我以为既是必须除去可能是欺骗的自我的真切,也是可以反衬单薄虚构的真切。对于我来说,就是放下成见、偏见和自我为中心,描述并且重新创造切实所见的那些,对逝去的岁月再做一些挽留,对过往的生活再做一些擦拭,透过各种遮蔽,看到往事之于我从来不知道的形相和光泽。

基于现实的科幻文化辐射力

——《三体》世界观的能动表达
方冠男

《三体》电视剧热播,网友称赞该剧遵从原著的改编策略。而在笔者看来,小说文本的影视化过程中最关键之处,在于虽然增加了角色,扩充了情节,但赋予了原著的世界观不可撼动的权威性。

那么,《三体》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又具有何种魅力,能够让读者群体如此膺服,甚至不能接受分毫改动呢?

《三体》系列的分部标题可以说明原因——从《地球往事》到《黑暗森林》,再到《死神永生》,三部小说形成了层层递进的结构,为我们提供了“推己及人”的思考逻辑。这说明,恢弘壮丽且冰冷残酷的三体宇宙,无论如何广袤,它的基本认知逻辑都是从地球乃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开始的。换言之,刘慈欣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将其扩写为宇宙社会,《三体》中“宇宙社会学”的原型是“人类社会学”,宇宙的“猜疑链”则来源于人类文明乃至于国际关系的“猜疑链”,整个“黑暗森林”理论的实质是文明冲突,这就使得三体宇宙显现出了极为精准甚至辛辣的现实针对性。小说中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彼此猜疑、威慑、对峙的完整过程,可以非常准确地适配现代历史乃至于今的完整进程;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描写,也能够极为准确地人类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中找到典型。这种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的强现实针对性,使得大量《三体》读者并未把这一小说当作幻想文学来理解。而原作在国内外的广泛出圈,也让我们看到了当科幻照进现实时所具备的强大文化辐射力。这对于国产科幻作品今后的创作方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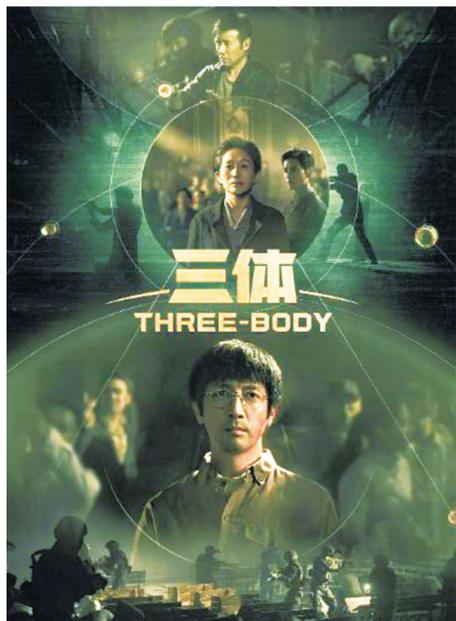
现实,是一切文艺作品直抵人心的共性,《三体》小说具备了这一点,正因如此,电视剧对原著的还原,既是尊重《三体》世界观,也是尊重现实本身。

当然,在还原世界观的时候,电视剧《三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在:

编剧团队较准确地剧中提炼出两个典型符号元素,即“虫子”和“圆”。“虫子”,是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电视剧亦特别突出表现,同时,剧中“虫子”出现时还往往伴随着“平面”,这就使得作为元素的“虫子”引申出了“二维”的视野理念,当“虫子+平面”出现时,就指向了低维文明对世界的认知局限。这又呼应了剧中反复提及的“火鸡与农场主”关系,使得整部剧显现出整一旦有深度的美感。剧集提炼的“圆”这一符号通过天体、粒子、桌球、苹果、塑料球、纸带圆孔、镜头、宇宙模型、量子、眼球等强调出来。圆,这种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同形同构的符号,繁简相协却又无所不包,在剧中成为了最基本也最多的元素。

编剧团队通过补充剧集情节的内容,较为准确地强调了《三体》世界观的部分奥义。如,在补充汪淼人物性格的同时,除了完善他的人物成长之外,还特别描绘了他的家庭生活——这指向了“宇宙很大,但生活(生命)更大”的世界观内涵;再如,剧集特别将大量笔墨放在了ETO(小说中的地球三体组织)的内部分裂上,此处改编用意颇深,更完整立体地阐述了人类社会中的“猜疑链”,人和人的猜疑尚且难以破局,更何况宇宙文明之间?同时,ETO内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在三体人面前展现出了“人心”的不可知和复杂,这给予了后来三体人表示“害怕”人类以充分的心理依据。

《三体》世界观,既架构在科幻的想象之上,也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无论《三体》想象力如何恢弘壮丽,地球往事,永远是故事的现实起点。



电视剧《三体》海报